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21.09.002

智库专稿

#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及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启示

李天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以 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构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还原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探究今后要走的道路。“一五”时期的工业体系构建不仅是工业项目,更应该被视为关乎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4 个领域的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做法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其历史成就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主要体现在奠定工业发展基础、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壮大国有经济、推动城镇化第一次高潮以及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6 个方面。对“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再审视表明,在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要强调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因地制宜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短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以及统筹发展与安全。

关键词: 国内大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一五”计划; 156 项工程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21)09-0009-12

##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应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此作为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其中,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形成双循环的前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推进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sup>[1]</sup>,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相类似的,在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身处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环境之中。一方面是国际交往受限、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的外

收稿日期: 2021-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6 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19ZDA224);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156 项工程对中国产业集聚的长期影响研究”(2020YQNQD004); 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课题“国有经济发展路径研究”(GJZK20210202)

作者简介: 李天健,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经济史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李天健.“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及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启示[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9): 9-20.

Citation format: LI Tianjian.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smooth domestic circula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21(9): 9-20.

部环境,另一方面是国内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以及畸形的工业布局,国民经济举步维艰。在众多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的情况下,通过积极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展贸易,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156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建设现代化工业,为我国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直到现在关于“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学术研究依然很有限,且较多的局限在工业、对外关系、城市建设等领域中。事实上,“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意义远远不只局限于工业项目,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项关于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领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本文认为“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的奠基石,对于当前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诸多借鉴之处。

本文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历史意义。通过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分析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确立和实施建设的时代背景;随后梳理“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领域的一系列具体做法和成效,并总结“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历史成就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对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举步维艰的国民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经过长期战乱,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时代,良性畅通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尚未形成。经济恢复工作面临着重重阻碍,工业发展受战争冲击尤为明显,1949年工业总产值(包括个体手工业)不及193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工业总产值最高年)的50%,电力、原煤、原油、生铁、钢、棉纱、面粉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最高也只有解放前最高年的七成左右,生铁产量甚至只有1943年的13.9%,全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此时仅剩124亿元<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产业仍然是工农业生产中的主流。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传统产业占比83%,新式产业只有17%<sup>[2]</sup>。从产业划分来看,按照当时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为245亿元,比重达到84.5%,工业总产值只有45亿元,占比仅为15.5%。即便在工业内部也以轻工业为主,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很低,轻重工业产值分别为32亿元和13亿元,比例为2.46:1。加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使得重工业的恢复困难重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了70%<sup>[3]</sup>。同时,工业技术水平低下、门类短缺问题表现得同样明显,例如当时的机械工业无法制造汽车、拖拉机和飞机等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化设备,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机械厂,多半只能从事修理和装配业务。

再将焦点转移到当时的工业布局,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国土面积1/3的西北地区在1949年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sup>[4]</sup>。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7年统计,仅上海、天津两地的工厂数就占到当时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的61%<sup>[5]</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短期内仍然没有改变。1952年,沿海地区在当年工业总产值的占比超过2/3,达到69.4%,其中轻工业占比71.5%,重工业占比65.5%,而占全国国土面积3/4的内陆地区,其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不足1/3,并且所谓沿海地

① 国家统计局《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60年。

区的工业,也仅仅是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和辽宁、江苏、山东等省的部分城市中,仅上海一市就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0%<sup>[6]</sup>。从不同工业部门的区域布局来看,1949年全国90%以上的发电站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几座大城市和东北地区,其中后者占全国发电量的30.1%;作为轻工业代表的纺织工业,全国总计500万锭中有83.6%集中在沿海3省2市(苏、鲁、辽、津、沪),其中仅上海就占到棉纺锭的47%,毛纺锭的70%<sup>[7]</sup>。

当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布也极不合理,严重向沿海地区倾斜。占全国国土面积60%的西部地区交通闭塞,其铁路运输里程在1949年只占全国的5.4%,公路运输里程只占24.6%。广袤的西北地区除陕西省有少量铁路外,其余如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份没有一根铁轨<sup>[7]</sup>。这使得内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沿海工业生产和内地原料产地严重脱节。同时,工业生产在沿海少数城市高度集中对于国防也是十分不利的<sup>[6]</sup>。由此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1952年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有各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整统计记录的年份,从当年的情况来看,在当时的29个省市中(不包括西藏),江苏的经济总量最高,名义GDP为48.41亿元,而最低的青海只有1.63亿元,后者只有前者的大约三分之一<sup>①</sup>。除经济总量外,当时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东部地区的城市密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且城市发育更加成熟。据194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编印的《中国之行政督察区》刊载,当时全国共有67个设市城市和2016个县,另有21个旗和35个设治局。从表1中可以看出,按照当下四大区域的划分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部地区不仅设市数量和城市总人口优势明显,其平均城市规模也要数倍于其他3个地区。

表1 1948年四大区域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规模<sup>②</sup>

区域	设市数量/个	城市总人口/万人	平均城市规模/万人	最大规模城市
东部地区	19	1 319.43	77.61	上海
中部地区	7	197.88	28.27	汉口
西部地区	14	360.08	25.72	重庆
东北地区	18	502.02	27.89	沈阳

注:1. 其中不包括台湾地区的9个城市;2. 东部地区的湛江和烟台缺少城市人口资料,因此东部地区在计算城市总人口和平均城市规模时只包含17个城市

### 三、“一五”计划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在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历史经验

#### (一) 生产领域: 优先发展重工业, 引进吸收先进技术

当时阻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问题在于技术水平落后导致的生产力低下,工业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sup>[8]</sup>,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严重滞后、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衡的问题则是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实依据。156项工程的行业布局充分体现了这种现实需要,在实际实施建设的150个重点项目中,只有佳木斯造纸厂1个轻工业项目,其余149个皆为重工业项目。具体按照行业来划分,煤炭和电力占据三分之一,各有25个项目;钢铁、有色和化工共有25个项目,且项目实际投资额巨大,其中鞍

①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

②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1948年4月编印的《中国之行政督察区》计算整理得出。

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的实际投资规模要远远超过平均水平;机械项目数也占总数的近六分之一,达到24个,为重工业中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配套支撑。同时,为加强国防实力,156项工程中还包括44个军事工业项目,分布在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等领域。

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确立和全面实施建设也直接推动了国内急需的工业生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对于提升当时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在156项工程的建设中,苏联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在地质勘察、厂址选择、设计施工、建筑安装、开工运转、技术人员培养和新产品研发等一连串环节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援助和指导。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更是增加1倍有余,达到55吨。同时,为了实际落实156项工程的建设,苏联方面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数据,根据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为推进1954—1957年工业项目顺利实施建设,苏联共向中国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规模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sup>[9]</sup>。

## (二) 分配领域: 投资完全向重工业倾斜,且主要布局于内陆地区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作用和反作用于生产,作为生产前提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决定生产<sup>[10]</sup>。“一五”时期的工业体系构建并没有打破当时以平均化为特点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其在分配领域的一系列做法仍然体现了时代特征,例如国家统一培养和分配劳动力,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人口规模的扩大又推动了现代化工业城市迅速成长<sup>[11]</sup>。除此之外,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实际效果和重要意义在分配领域中的两个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在生产领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要求下,投资大量向重工业集中就成为了当时构建工业体系的鲜明特征之一。按照“一五”计划的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为88%和12%。这不仅是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是考虑到当时阻碍轻工业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材料的短缺,其中部分来自于薄钢板、铝、化学产品等重工业产品的缺乏,因此在提升重工业产量之前,对轻工业加大投资的效果十分有限<sup>[12]</sup>。在实际实施中,1953—195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24%、5.86%和31.97%,1956—1957年分别为7.95%、6.86%和40.2%,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1951年的50%左右上升到“一五”计划时期的85%<sup>[13]</sup>。156项工程的实际投资更是几乎完全都在重工业领域。

另外,工业项目的布局还具有鲜明的区域平衡发展的特征。由于“我国工业原本畸形地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状态,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sup>[14]</sup>,因此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较为集中的布局于内陆地区,以此来平衡当时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表2呈现了156项工程空间布局和投资的具体情况。以当前四大板块的区域划分来看,实际实施建设的150个工程项目中,仅有9个项目布局于东部地区,且只分布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在其他三大区域中,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布局37个、48个和56个项目。按照工业类别划分来看,在106个民用工业项目中,50个设在东北地区,32个设在中部地区;在44个国防工业项目中,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21个被安排在川陕两省。从城市的角度来看,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西部地区的包头、西安、兰州、成都以及中部地区的洛阳、太原、武汉、株洲等城市。

表2 156项工程布局与投资情况<sup>①</sup>

区域	省份	项目数	比重/%	计划投资额/万元	比重/%	实际投资额/万元	比重/%
东部	北京	4	2.67	24 356	1.20	25 194	1.28
	河北	5	3.33	28 077	1.39	28 264	1.44
	总计	9	6.00	52 433	2.59	53 458	2.72
中部	山西	15	10.00	133 531	6.60	131 880	6.72
	安徽	1	0.67	1 500	0.07	1 486	0.08
	江西	4	2.67	24 697	1.22	25 132	1.28
	河南	10	6.67	261 604	12.94	159 704	8.14
	湖北	3	2.00	170 178	8.42	154 805	7.89
	湖南	4	2.67	13 217	0.65	14 255	0.73
	总计	37	24.68	604 727	29.90	487 262	24.84
西部	内蒙古	5	3.33	160 897	7.96	159 003	8.11
	重庆	1	0.67	3 064	0.15	3 561	0.18
	四川	5	3.33	25 492	1.26	18 521	0.94
	云南	4	2.67	57 681	2.85	55 602	2.83
	陕西	24	16.00	182744	9.04	171 403	8.74
	甘肃	8	5.33	146 614	7.25	139 736	7.12
	新疆	1	0.67	3 270	0.16	3 275	0.17
	总计	48	32.00	579 762	28.67	551 101	28.09
东北	辽宁	24	16.00	459 537	22.72	507 521	25.88
	吉林	10	6.67	136 558	6.75	145 510	7.42
	黑龙江	22	14.67	189 161	9.35	216 483	11.04
	总计	56	37.34	785 256	38.82	869 514	44.34

### (三) 交换领域: 逐步完善计划体制 扩大对社会主义阵营贸易

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的全面缺乏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使得需要大规模投资且建设周期较长的重工业项目,只有通过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才可能实施推进。在工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不仅就投资的规模、结构以及布局等做出宏观决策,而且担负着项目建设的微观决策和施工管理<sup>[12]</sup>。相应地,为保障156项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一系列各级计划机构相继建立,基本建设管理职能逐渐确立。

交换领域的另一个进展就是工业体系构建直接推进了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事实上,以156项工程为主体的苏联对华“无私援助”并不是单向、无偿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大力发展与苏联的贸易往来在“一五”计划时期被放在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扩大我国对苏联的贸易,稳步扩大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sup>[14]</sup>,当时的对外贸易部也提出“重要机器设备和物资的进口主要依靠苏联,有些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能够供应者,则应先向他们订货,以减轻苏联负担”<sup>[15]</sup>。由此,在整个“一

<sup>①</sup> 根据原国家计委于1983年发布的《“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计算整理得出。

五”计划时期,中苏贸易额始终维持在高位,最高峰的1955年中国从苏联进口额达到近11.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贸进口总额的64.6%。同时,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在不断增长,由1953年的约3.5亿美元增长到1957年的约5.2亿美元,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14.88%提升至16.80%。其中,在所有进口货物中,生产资料占据绝大比重<sup>①</sup>,单是1954年生产资料就占到当年从苏联进口货物的97%<sup>[16]</sup>。另外,按照确定156项工程时与苏联签订的相关协议,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国际通用货币以及丝绸和手工艺品等<sup>[17]</sup>。例如,1954—1959年,中国共向苏联提供16万吨钨砂、11万吨铜、9万吨橡胶、3万吨锑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156项工程补偿的一部分<sup>[6]</sup>。对外贸易部甚至明确要求“重要物资(如油脂、油料、花生、大豆、大米、杂粮)之出口部分,应首先满足苏联需要”<sup>[15]</sup>。

#### (四) 消费领域:重要工业产品从无到有、由短缺到基本满足需求

消费同样是由生产所决定的,生产性消费与生产是同一的,构建工业体系的投资倾向、技术引进和空间分布等决定了其对消费领域的深刻影响。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所带来的工业生产能力的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并且由于其以重工业为主的特点,这些项目在消费领域的表现是极大提升了生产资料的供给,多种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产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钢铁工业是当时工业建设的重点之一,经过5年建设,1957年生铁、钢和成品钢材产量分别达到594万吨、535万吨以及415万吨,钢产量年均增长高达32%,其中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产量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sup>[6]</sup>。在产品类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只能生产100多种碳素钢,到1957年,生产的钢材品种已达4000余种,过去不能生产的钢轨、无缝钢管、大型钢材、薄板和合金钢等均已经开始向市场供应<sup>[12]</sup>。同时,对于电力行业,156项工程包括23个火电项目,设计发电量为136.5万千瓦,其中70.2%在“一五”时期内发电,大大缓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对于有色金属行业中重点建设的铜、铝工业,5年间,铜工业新增采选能力218.7万吨、冶炼能力0.7万吨、电解能力1.9万吨,铝工业新增铝氧生产能力12万吨、电解铝能力3.9万吨<sup>[6]</sup>。

机械装备工业的发展是156项工程推动重要工业产品从无到有的典型代表。正如上文所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机械装备工业始终没有摆脱修配的性质,但是通过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投入,到1957年底,中国已经能够自主生产汽车、拖拉机、石油化工设备、发电设备、工程机械、冶金矿山设备等几十种过去没有的机械装备工业产品。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大大提升,“一五”时期国家建设所需设备的国内自给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迅速提升至60%以上<sup>[18]</sup>。

## 四、“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

### (一) 奠定了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坚实基础

打造完整工业体系,改变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轻重比例失衡和技术装备落后的局面是实施建设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初衷之一。尤其是156项工程的建设使得中国有了几十个过去没有、行业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门类<sup>[18-19]</sup>,能源、机械、军工等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

① 在这些进口的生产资料中,成套设备主要由苏联方面供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美国所谓的“禁运”物资。

一大步,推动中国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且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雏形。同时,由于苏联当时为中国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世纪,许多门类达到了国际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的发展水平<sup>[18]</sup>。随着工业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43.1% 提高到 1957 年的 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 1952 年的 35.5% 提高至 1957 年的 45%<sup>①</sup>。到 1959 年,中国钢产量由世界第 26 位上升至第 7 位,煤油产量从第 9 位上升至第 3 位,发电量由第 25 位上升至第 11 位<sup>[20]</sup>。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提升,为中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整个“一五”时期,第二产业年均增速达到 18.1%,其中轻重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 25.4% 和 12.9%,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轻工业由 64.5% 下降到 55.0%,重工业则由 35.5% 上升到 45%,大大改善了当时轻重工业比例失衡的问题<sup>[21]</sup>。

## (二) 平衡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区域经济差距

“一五”时期工业项目的空间布局,在较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全国的工业布局,平衡了区域经济发展<sup>[12]</sup>。无论是 156 项工程的计划投资额还是实际投资额,东部地区都是最低的,在 156 项工程总投资额中的占比均不到 3%,而中部、西部地区的计划和实际投资额占比均接近 30%。按照最终实际完成投资来看,处于内陆地区的黑龙江、陕西、河南和内蒙古 4 个省份,其实际获得的投资额在 156 项工程全部投资中的占比都达到了 8%~11%。156 项工程及 900 余个大中型项目所带来的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各省份工业总量的迅速增长,整个“一五”时期,内蒙古、甘肃和山西 3 个内陆省份工业总产值的增幅都在 200% 以上,中西部省份的增长速度要普遍快于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上,“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绝不仅仅只表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后甚至是新世纪,其影响也依然存在。从表 3 可以看出,布局过 156 项工程的城市,其市辖区在 2016 年的人口、经济总量、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财政收入的均值都要远高于其他城市 and 全部样本城市。其中,布局过 156 项工程的城市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值更是几乎两倍于其他城市。在去除直辖市后,各项指标之间的对比结果依然成立。

表 3 不同类别城市 2016 年基本情况对比<sup>②</sup>

类别	城市数/ 个	人口均值/ 万人	GDP 均值/ 亿元	工业总产值/ 亿元	财政收入 均值/亿元	
总样本	布局“156 项”的城市	49	275.80	2 614.93	2 771.30	313.40
	其他样本城市	237	140.26	1 431.79	2 152.87	167.96
	全部样本城市	286	163.48	1 635.21	2 258.82	193.14
去除 直辖市	布局“156 项”的城市	47	206.43	1 845.49	2 017.22	184.30
	其他样本城市	235	130.84	1 247.17	1 922.09	130.82
	全部样本城市	282	143.44	1 347.25	1 937.95	193.14

注:由于缺少统计资料,去除 156 项工程中的个旧电站和云南锡业公司,表中实际包含 148 项重点工程,同样按照 2010 年行政区划涉及 4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 均值、工业总产值均值和财政收入均值按照当年价格计算

## (三) 催化了工业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的飞跃

156 项工程及 900 个大中型项目的实施建设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的技术转移,实现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② 根据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步的第一次飞跃,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从解放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迅速提升至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sup>[18]</sup>。然而,在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当时中国对于先进技术的态度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引进”上,而是要求必须“消化吸收”,以此推动独立自主的工业技术水平在引进设备的过程中能够同步提高。对于在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设备,由国内制造供货的比重,按照重量计算是52.3%,按照金额计算为45.9%<sup>①</sup>。如果不是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即便得到由苏联供给的产品设计图纸,也无法在国内进行制造。中国在当时成功吸收消化苏联先进技术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一五”计划时期中国派遣了大量青年技术人员到苏联的高校、科研院所和设计机构等部门接受培养锻炼。经过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建设,中国的工业技术和研发实力的迅速提升,开始有了过去没有的汽车、飞机、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现代工业门类,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sup>[24]</sup>。

#### (四) 壮大了国有经济的规模和实力

面对刚刚成立之时经济凋敝的国内形势,中国选择公有制道路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一致的逻辑,对促进国民经济步入正轨和维护社会基本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在逐步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实施建设的156项工程的全部项目都属于大型国有企业,与当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特殊国情下实施的追赶和跨越式发展战略具有天然的耦合性<sup>[25]</sup>。更进一步,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能源、电子、机械、钢铁以及航空航天等行业,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直接填补了部分空白,在短时期内大大提升了国有经济的规模和实力,进而打下了之后70多年工业发展中国有经济的基础。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在“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中诞生的国有企业依然是行业中的中流砥柱,代表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例如,156项工程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武汉钢铁公司、热河钒钛联合工厂、鞍山钢铁公司、大同鹅毛口立井、山西潞安洗煤厂项目已分别演变为今日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集团,并且上述企业在2020年都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在2019年的营收额更是高达6177.3亿元,利润达到440.5亿元。

#### (五) 主导了城镇化的第一次高潮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一五”时期的城市发展从属于工业建设<sup>②</sup>,156项工程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对于当时城镇化的趋势和空间格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sup>[27-28]</sup>。随着工业体系构建的全面展开,大量重工业项目在城市中布局建设,推动了一大批工业城市的迅速崛起,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工业体系构建的推进不仅扩大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规模,尤其是在城市发育严重滞后的广大京广线以西地区,更是首次出现了许多新兴工业城市、新工业区和工业镇。这一时期,全国共新建了6座城市,其中5座城市位于京广线以西;大规模扩建了20座城市,其中位于京广线以西的有11座,东北地区有7座<sup>[29]</sup>。在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后续的工业生产,其直接结果是“一五”时期的五年间中国城镇化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城镇化率增长

① 按照1955年的另一项粗略统计,156项工程所需设备的30%~50%由国内制造<sup>[22]</sup>。关于这一问题,薄一波在1958年2月也曾宣布:“156项工程所需设备,由国内制造的部分将由1957年的42%左右,提高到1958年的60%左右。”<sup>[23]</sup>

② 毛泽东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革命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只有这样“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sup>[26]</sup>。

2. 93% ,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间中国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sup>[30]</sup> ,在新世纪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前也仅次于“六五”计划和“九五”计划时期。

#### (六) 确保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恶劣的外部环境使得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156 项工程及 900 余个大中型项目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重大工程 ,自然充分体现了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意愿 ,并在实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 ,国防安全是工业项目空间布局的考虑因素之一<sup>[12,31]</sup> ,诸多建设项目 ,尤其是国防工业项目布置在后方地区<sup>①</sup>;其次 ,156 项工程最终实际投入施工建设的为 150 项 ,其中国防企业有 44 个 ,占到近三分之一 ,其中兵器部 16 项、航空部 12 项、航天部 2 项 ,这些项目都成为了中国国防力量的重要基石;最后 ,正是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体系构建 ,中国才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为此后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 ,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sup>②</sup> ,这正体现了“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

### 五、“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启示

#### (一) 改善供给质量 ,强调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

“一五”时期的工业体系构建填补和加强了重工业中多个领域的生产 ,为轻工业、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生产资料 ,也丰富了消费品市场的供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重视优化供给结构 ,着力提升供给质量 ,强调供给侧对需求侧的重要作用。虽然外部环境深刻变化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带来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 ,但越是如此越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把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作为推进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主攻方向 ,统筹好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关系 ,加强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之间的政策协同。

#### (二) 推进科技进步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成功实施离不开苏联等国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但正如前文所述 ,当时对待先进技术的态度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引进”上 ,而是更进一步的“消化吸收” ,进而以此为基础培养自己的科研力量。以史鉴今 ,我们应该明确树立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当前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占据主动的关键性、基础性地位。尤其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频发 ,我们更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 ,加强基础研究 ,注重原始创新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 ,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加快推进新技术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同时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经验向我们展现了培养科研队伍的重要性 ,“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全方位培养人才对于科技创新依然至关重要 ,既要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也要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的培养 ,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显著提升。

① 例如 ,当时审查厂址时 ,要把厂址标记在地图上 ,并用直线标出它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美军基地的距离 ,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sup>[32]</sup>。

②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时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9595/41794/index.htm>。

### (三)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短板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成功证明了平衡区域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可以说“一五”计划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也是改革开放前所制定并实施的最好的五年计划<sup>[12]</sup>。那么,“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在平衡区域发展方面为何会取得成功并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一是承认并继承了旧中国产业发展的遗产,且有效填补了内陆地区产业发展的空白;二是其布局是建立在多年科学研究规划的基础之上,如沈阳、西安、郑州、武汉、成都等“156项”重镇的区位优势明显,在之后的漫长时期逐渐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通枢纽,使得它们在改革开放后也能够利用区位优势不断发展。因此,借鉴“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成功经验,健全区域重大战略,针对不同区域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推动不同区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补齐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短板,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

### (四) 重视流通环节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工业体系构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国家对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尤其注重补齐中西部内陆地区在交通方面的短板,新建了大量的铁路和港口等设施,同时在交通运输行业中也大力推广“苏联模式”,这些都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sup>[33]</sup>。事实上,当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强调为工业化服务的指导方针,从“适应物资流转的要求,便利客货运输来考虑问题;而绝不是单纯孤立地从赚钱多少来考虑问题和考核企业的业绩”<sup>①</sup>。基于“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同时,要统筹规划全国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认识到新基建为加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精准把握新基建在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解决民生短板问题中的重要意义和实施路径。

### (五) 扩大内外交流 积极融入全球经济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苏联等国的援助,这些援助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积极拓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且也不放弃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规模的机会<sup>②</sup>。在改革开放43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外资流入国,2020年全年货物进出口32.2万亿元,但依然要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156项工程经验告诉我们,一是要继续扩大市场准入,在更高水平上引进外资;二是要促进贸易创新发展,稳步提升出口质量;三是要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六) 严格科学规划 统筹发展与安全

“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表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建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之上,既

① 《交通部党组关于1953年全国交通会议的总结报告》,1953年10月15日,11月7日经中共中央转批。

② 例如,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对外贸易部针对“封锁”“禁运”的松动和有可能出现的与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的扩大,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要求外贸部门有重点地加强对资本主义国家供求情况、市场行情、经济集团和政治派别的调查研究。

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也要具有前瞻性。新时期的科学规划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发展与安全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首先,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时代要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次,保障安全为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防范和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 参考文献:

- [1] 董志勇,李成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5):47-55.
- [2]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3] 郭瑞楚.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
- [4]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综合卷[G].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 [6]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 [7] 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9]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24-37.
- [10] 逢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J].经济学家,2016(2):5-15.
- [11] 何一民,周明长.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年)[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2):70-77,127.
- [12] 武力,董志凯.中国经济运行分析(1953—195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3]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 [14]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商业卷[G].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 [16] 李哲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N].人民日报,1955-05-12.
- [17]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95-109.
- [18] 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J].党的文献,1999(5):28-34.
- [19] 王奇.“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2):110-116,127.
- [20]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N].人民日报,1959-10-06.
- [21] 韩保江,杨丽.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成就与基本经验[J].改革,2019(7):5-1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24] 王延中.论中国工业技术的现代化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4(5):23-29.
- [25] 李政.中国国有经济70年:历史、逻辑与经验[J].社会科学辑刊,2020(1):11-18.
-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7] 蒋永穆,李善越.新中国70年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思想演进:历程、主线及动力[J].政治经济学报,2019(3):19-33.
- [28] 周加来,周慧,周泽林.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回顾·反思·展望[J].财贸研究,2019(12):1-13.

- [29] 董志凯. 论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建设——两个阶段的背景、特点与前瞻[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3): 5-15.
- [30] 吴莹.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城镇化与城乡关系: 历程、变迁与反思[J]. 社会学评论, 2019(6): 82-95.
- [31] 李百浩, 彭秀涛, 黄立. 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 156 项重点工程为中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4): 84-92.
- [32]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33] 在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中 苏联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发挥重大作用[N]. 人民日报, 1952-11-09.

##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smooth domestic circulation

LI Tianj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with *156 Projects* as its core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unblocking the benign cycle of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China. Only by restoring history,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miracle of today and the road to be take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is not only industrial projects, but also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related to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economy. A series of targeted practices in four field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have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t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e as follow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lanc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state economy, promoting the first climax of urbanization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shows that in the current time of in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the supply leading and demand creati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upplement the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romoting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Key words:** domestic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156 Projects*

(责任编辑 牟 怡)